



大學

周刊

中國科學報

2012 年 07 月 04 日

周三出版

【主編觀點】

离别的意义

 风凰花开，校园里最狂欢也是最伤感的日子又来临了。本期，我们特地策划了一组关于毕业的文章，有生动的毕业现场扫描，也有以往几十年来历代毕业生的回顾。尽管时光流转，但在这样的日子，学生的心中都充满不同而又相同的思绪和情感：满足、遗憾、感恩、眷恋、友谊、爱情、向往、决心、斗志……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离别的诗句，最浪漫最伤感的莫过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而每一位曾经的学子心中，

无不有一个自己的康桥，无不有一份对康桥的眷恋与责任。

 离别，或许是一个伤感的结束，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一个新生的起点。在大学里，莘莘学子学到了知识技能，获得了成长成熟，同时更获得了文化的责任与传承。当他们踏出校门，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脚踏实地地走向社会时，或许更应该告别伤感，用一种自信、一种责任、一种坚持来面对新的生活。路的前方，不仅有理想，有希望，更有期待与责任……

高校掐尖战何时休

■本报记者 温才妃

6月的骄阳里，高考学子们的忙碌感、紧张感还未散尽，一群更加忙碌的人群正向着他们当中的“疑似状元”、“高分段考生”扑来。

四川高三学生林某被一家网站封为“状元”，媒体蜂拥热炒后，林某发现自己与状元的分数有67分之差，“被状元”导致林某大受刺激。

凌晨得知高中吉林省状元，李一涵还未来得及走出家门庆祝，北大、清华招生办就打电话来李家“抢状元”。

同样的高校掐尖场面多年上演。为何舆论呼吁批判多年，教育部三令五申持续限制，高考掐尖大战依然无休无止？

热捧状元的背后推手

教育部刚刚发布“十不准”禁令，禁止各种形式的“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等行为。

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就要求禁止炒作状元，可在实际中却不尽如人意。

一组名为“人大附中学生雨中拜状元”的照片在网上风传，照片中一名身着人大附中校服的中学生，正在向北京市新科文理状元的照片鞠躬。该校学生说，“学校出了市状元就会摆放照片，这已成惯例”。

记者近期在网上发现，一些知名门户网站仍在高调地宣传状元，制作状元榜单专题，张贴状元的大头照、专访，甚至还打出了“寻找身边的状元，予以奖励”的公告。

知情人告诉记者，某些地方政府对状元的宣传不遗余力，“不只是奖励市状元、区状元，现在连镇状元都出现了”。

“在现行的体制下，热捧状元、掐尖的形势只会愈演愈烈，无法阻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主任郑庆华说。

郑庆华指出，热捧状元的背后是名利的博弈，背后的推手主要是中学和地方政府。“哪个中学出了状元，该校的名气就会大增，未来的生源就会越来越好；哪级政府管辖区出了状元，主管教育的领导就有政绩可宣传。没有利益和考评，何来热衷？”

尽管大学招生办人员明白“高分不等于优质生源”，但仍无法跳出简单的招生“政绩观”怪圈。“大学怎样考评招生办的成绩，主要是看提档线分数、高分段考生人数等指标是否比同类院校、比往年要高。高校至今仍没有破除状元招生观，这令人非常遗憾。”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说。

在掐尖的浪潮下，谁还应该为此负责？武书连的大学排行榜中，本科生培养的二级指标中就有新生录取分数线，分数的高低影响着大学当年的排名。

有些用人单位宁可招聘“985工程”高校的平庸学生，也不要普通院校中有能力的大学生。

掐尖缘于评价标准单一

从2004年至2012年，北京21名高考状元中有11人投向香港高校。今年初，排名世界前100的悉尼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之后有多所澳洲、欧美高校尝试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真正的公平是一种更大的权利——考生可以申请多所高校，同时被多所高校录取，而不是被某所高校圈定，而这项有权利的公平还应伴随着对教育的监督权与评价权。

从来有大学的地方，就有争夺优质生源的存在。

“争夺优质生源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评价标准单一——唯分数论，导致竞争变为恶性。这是目前中国高校生源奇劣的不良现状。”天津大学招生办主任李振宇说。

据他介绍，美国高校采取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其中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等全国性考试仅占录取权重的50%-60%。不同高校对考试的要求各异，例如斯坦福大学对ACT分数的要求仅占40%左右的权重，伯克利大学占60%左右的权重，并且这一权重因人而异。“在美国，高校之间因各自评价体系不一样，没有可以比较的分数线，自然没人追逐状元。在这种模式下，高校录取的是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而绝非分数高的学生。”

与中国高考“一刀切”的模式不同，美国高校在招生时，会考查学生在高中时期各个阶段的学习表现，以及社会活动能力等，进而决定是否录取。“他们也拒绝了不少接近满分的学生，而录取了分数较低的学生。如斯坦福大学每年要拒绝150多个SAT满分的学生。这在中国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李振宇说。

然而，同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在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统一录取的大前提下，倘若一所大学录取第一名，而录取第二名、第五名，这所大学即便陷入“不公平”的质疑声中。

“在中国，以分数衡量的公平，牺牲了人才选拔内涵的东西。”郑庆华不无遗憾地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分数公平原本就是脆弱的公平，受教育条件不同的学生，回答同样的卷子，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真正的公平是一种更大的权利——考生可以申请多所高校，同时被多所高校录取，而不是被某所高校圈定，而这项有权利的公平还应伴随着对教育的监督权与评价权。现今的高考是在行政主导下的地方录取制度，是一种老百姓缺失选择权的制度。制度上普遍没有自主教育的权利，又怎么能让人相信是公平的？”

自主招生仍在循环掐尖怪圈

“状元‘嫁’给清华、北大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认识，到了其他学校就成了‘下嫁’，这种观念非常不好。”郑庆华说。

在国外，学生是按学科排名选择学校，而清华、北大并不是每个学科都是最强的，依此逻辑，状元应该遍布各学科的强校才是良性状态。

一场朴素而温馨的生日聚会

——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宁90华诞学术纪念会侧记

■本报记者 钟华

6月30日上午，一场学术报告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招待厅进行，这场学术纪念会的主题是庆祝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90华诞。在杨振宁的坚持下，这场纪念会自10年前清华举办的那场有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0余位两院院士参与的80华诞纪念会要低调得多。然而，这场纪念会却更加像是一场师友间的生日聚会，有一种朴素而温馨的味道。

纪念会开始，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代表学校向杨振宁赠送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方黑水晶印。印的上方镌刻着唐代诗人杜甫的一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印的四周镌刻了杨振宁在规范场理论、高能物理、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这四个领域的重要贡献。

杨振宁接过礼物说：“谢谢清华大学送给我这份非常重要的礼物。我一生90年来，接受过很多礼物，我仔细想想，今天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礼物，也是我一生所收到的第二件最重要的礼物。”

他影响了众人的人生

哈佛大学教授吴大峻、犹他大学教授吴咏时、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正在纪念会上分别发表演讲。他们从不同角度向在座师生讲述了这位物理学家大师不平凡的学术人生。

吴大峻还记得58年前——1954年他在哈

佛大学第一次听到杨振宁演讲的情景，杨振宁讲的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这场演讲改变了吴大峻的人生。两年后，他作出了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改随杨振宁学物理。

“我非常感激他接受我这个完全没有物理基础的学生。”吴大峻说。不仅如此，杨振宁还给他制定了一个8年计划：两年量子力学、两年统计力学、两年量子场论、两年粒子物理。作为一位聪明的学生，他很快就取得了学术上的成果。然而，杨振宁企图教他打桥牌却失败得一塌糊涂，吴大峻笑言自己打桥牌不仅错误百出，而且错得天马行空。

1972年暑期，杨振宁在北京大学作了两场报告。当时他或许不会注意到，台下有一位从兰州赶来的青年紧紧攥着托人“抢”来的人场券，看着眼前这位心仪已久的偶像，内心激动得无以言表。

这位青年就是如今犹他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吴咏时。他说：“这场报告对我的学术生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我选择把规范场作为我的研究方向。”1981年，他收到了来自杨振宁的实习邀请。

“我一生走了一个圈”

这几天，适逢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成立15周年。15年前，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杨振

宁亲任名誉主任，著名理论物理教授聂华桐任中心主任。借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而成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自成立伊始便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为了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发展，杨振宁亲自设计蓝图、倾力筹款。他不仅为高等研究院组建了专门的基金会，还带头捐出积蓄，甚至将国家给他的工资大部分都捐给了高等研究院。一大批海外顶尖学者受到他的感召而归国效力。

发展至今，高等研究院已在理论凝聚态物理、冷原子物理、理论计算机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会聚了众多国际一流学者。高等研究院创建了独特的机制和文化氛围，坚持国际一流标准选人，坚持评价重质不重量，坚持真正的开放和流动，吸引了一批顶尖科学家加盟，在这里潜心学问，自由探索。高等研究院培养了多名博士生和博士后，其中很多人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已经进入世界顶尖大学获得教职。

杨振宁曾说过：“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圈。我的最后事业是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也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

聂华桐教授用幻灯片展示了杨振宁1944年

身处招生一线，郑庆华发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考分最高的学生并不想当科学家，而是冲着某个专业最热门、哪个专业薪水高而来。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罪学生。如今的大学靠奖学金、科研经费、论文数、院士数、重点实验室等指标来吹捧综合实力，而忽视了大学育人的本质。没真正进过大学的学生，只能看这些表面的东西。”郑庆华说。

优质生源进校之后的教育回报如何？大学是否针对优质生源进行改革？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关心的并非这些，导致掐尖进来的学生逐渐产生心理落差，心理落差带来不认同感，而后很可能会选择离开。“大学越是抢下去就越会没落，不仅学校的地位会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容易陷入抢生源的恶性循环。”

那么，大学应该拿什么吸引高分段的考生？“不能靠奖学金。”李振宇指出了个颠倒的局面——国外高校的奖学金是学生申请入学成功后，高校认为资格符合给予；而中国某些高校是拿着高额奖学金，当做吸引学生入学的筹码。

“不能把科研放在首位。”熊丙奇表示，大学对外宣传说有良好的科研环境，但往往越是科研好的高校，教师的精力越无法集中在本科人才培养上。

“我们关注的是一所大学有多少老师真正为学生上课，是否建立起导师制，师生间是否有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学生能否获得多样化的教育，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熊丙奇说。

在学术期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一篇关于数学的论文。那时候杨振宁才22岁。然后，他又展示了杨振宁2012年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杨先生在物理界的贡献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清华的骄傲。”聂华桐说。

吴大峻分析、阐释了杨振宁在四个领域的贡献：“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开创性的理论。这四组文章，只要能完成一组，就很了不起的物理学家。这四组工作都是划时代创新领域的，并且包括了所有基本及重要的物理方向。”因此，吴大峻得出他的结论：“杨先生是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

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往往是揭示自然结构之美和触及灵魂的震动。“只有在自然科学中攀上高峰，登过顶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触。”吴咏时说，“杨先生就是这少数幸运而伟大的人物之一。”

陈方正正是杨振宁的好朋友，学物理出身的他亦是一位文化学者。多年前，杨振宁为香港中文大学捐赠了许多学术档案，在查阅档案之余，陈方正也有很多感触：“关于杨先生，虽然现在已经有好几本很好的传记，但是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传记还没有。”

究其原因，他认为在于，作家中能懂得杨振宁学问的人很少，而物理学家中懂得写传记的不多。“从一位伟大的学者，得真正了解他，从一个平等的地位看他，才能把传记写得更好。”陈方正坦言这并不容易，得看历史的因缘。

中国大学评论

从文科“贻害社会”说看大学教育的偏向

■尤小立

有关文科“贻害社会”的言论，笔者最初是在微博上见到的。当时，一位朋友，也是某著名大学历史系教授立即正告这位自称“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的发微博者：“不懂历史学就不要乱说。”笔者则只当此说是在八卦，没想到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反响，最终酿成了一桩公共事件。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文科(后来当事人又称专指文史哲三科)“贻害社会”，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类似的话最常出现，也最容易引发口角和辩论，是在高中文、理分班之时。换言之，就思维上看，这个说法并没有超越高中生的水平。现在，当事人和一些新闻报道扯到上世纪50年代末C.P.斯诺的“两种文化”说，如果再加上当今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 的“三种文化”说，那只能把水越搅越浑，让真正的问题继续藏而不露，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但从这位“教授”的言论，至少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技术化”的偏向不仅影响着学生，而且也左右着管理者和教师的思维，从而形成了一种广泛性的话语霸权。

“技术化”的偏向是从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以行政手段进行的大规模的大学合并，其本意是希望纠正这种“技术化”倾向。但是，具体的操作者基本都是院系调整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技术化”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因此，无论怎么变，核心的理念还是“技术化”。这也是大学的规模越大，师生的感觉却越来越小；“文理渗透”最初还是口号，现在连口号也不再喊的原因。

要知道，所有的“技术化”都打着“科学”的旗号，以获得外在的合法性和内心的平衡。但“技术化”并非科学化，“科学”与“技术”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反映到思维上，前者是强调合理的怀疑，后者则多取标准化的程式。它们之间不多的重合处，在“技术化”思维为指导的人那里却仿佛是可以随意互换的。反映到大学教育中，“技术化”思维直接导致的是“有用”才有价值的庸俗实用主义的盛行。

当然，对某些技术性学科来说，“有用”就有价值是成立的。但将它普遍化，放之其他非技术性的学科，成为四海皆准的“规律”时，这种思维就显得荒谬了。这些年，文史哲专业的困难处境，不仅是社会需求减少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技术化”思维所衍生出庸俗实用主义原则极力地消解非实用专业的地位。说文科“贻害社会”的人，不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吗？但让拥有“技术化”思维的人无法预料的是，这样一路地“实用”下去，大学的角色必然向职业培训中心转变。大学的独立性日益地弱化，继而成为社会的附庸，最终直接挑战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存在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化”思维无视“人化”的可能性。妄论“技术创新”才是“创新”的人格恰是忽略了大学教育中的创新都应该是基于思维上的多样性的常识。多样性思维是“人化”最基本的体现，因为人本身就是多样的。只有在多样性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思维方式的碰撞和思想的进步。因此，即使“技术化”思维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它也只是“一样”而非“多样”。而长期的“一样”和标准化，则必然导致思维方式上的非此即彼的极端论或一元论。

让我们仍以这位自称“哈工大教授”的人的言论为例。当网友提示说“读史可以明智”时，他反驳道：“读史使人明智吗？老祖宗读了几千年史，最终也没明智起来。”我们不必讨论他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判断正确与否，因为他有权利批判，也有权利赞颂。仅就态度上看，他本人显然对历史研究缺乏起码的了解，因而也缺乏起码的温情。即便顺着他对传统的批判态度推论下去，他的结论仍不成立。他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读史，老祖宗是不是更不明智？这也反映出他的不仅是他的无知和学科偏见，也牵涉到对人——那些从事史学研究的——的尊重，而造成这种单一——而决绝态度的不正是他思维中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观吗？

一般来说，当人们的阅读经验缺乏时，直接的经验就会起到关键作用。仅凭对所接触的个别人文学科从业者的不美好的印象，就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文史哲等三门人文学科的价值。这说到底，就是教育的单一“技术化”偏向所致。

我们常常听人说，大学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但很少看到让众人共感的实践成果。从量化管理到各种工程、计划和重大课题的竞相推出，再到如今的大学章程的制定，有点像从GDP到“绿色GDP”，再到令人捉摸不透的“幸福感”的虚化演进。工作确是没有停顿，但没有落实理念的方法，没有对于自身思维缺陷的自觉，大学教育改革也只能是继续地工作，继续虚化地演进而已。

主編:钟华 編輯:温才妃
Tel:(010)82614599 E-mail:daixue@stimes.cn